

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

● 伍加伦 江玉祥 主编



古代西南絲綢之路 研究

繆鉞題簽

四川大学古代南方絲綢
之路綜合考察課題組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封面题字 缪 钺
责任编辑 张纪亮
封面设计 冯先洁

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

伍加伦 江玉祥 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四川大学内）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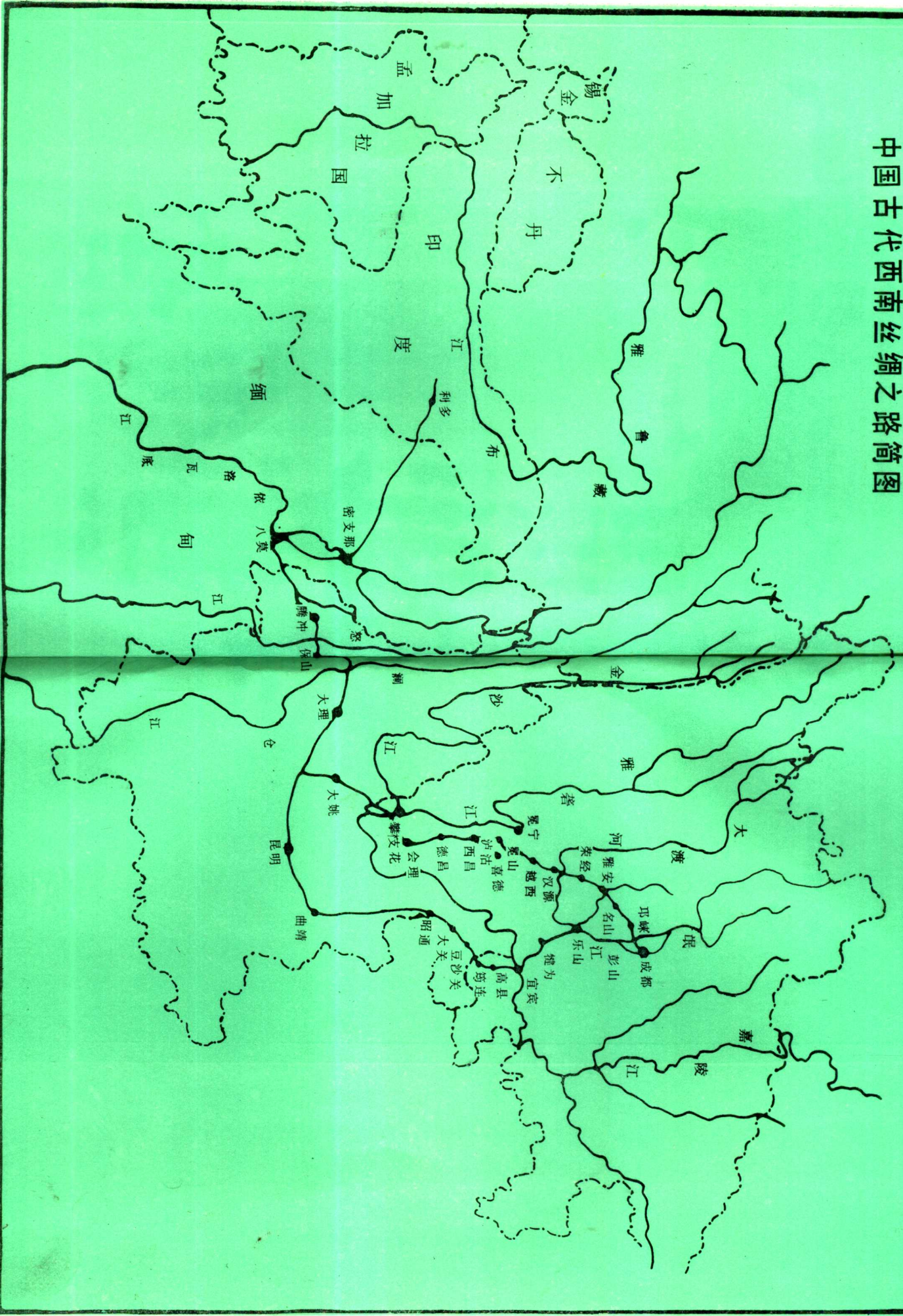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1/32 8.75 印张 210 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7—5614—0343—7/K·35 定价：3.90元

中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简图



目 录

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	童恩正 (1)
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	童恩正 (10)
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简论·····	江玉祥 (30)
历史上的南方丝路·····	汶 江 (42)
从考古资料看古代蜀、藏、印的交通联系··	罗开玉 (47)
滇越考 —— 早期中印关系的探索·····	汶 江 (61)
凉山博什瓦黑南诏大理石刻中“梵僧” 画像考·····	李绍明 (67)
试论道教对印度的影响·····	汶 江 (78)
试论密宗成立的时代与地区·····	张 毅 (88)
南方丝路古贝考·····	罗二虎 (97)
古代南方丝路上的贸易·····	李 连 (99)
中西陆上古商道 —— 蜀布之路·····	任乃强 (101)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四川民族初探 —— 四川东汉崖墓文化中的民俗 和宗教·····	史占扬 (116)
川滇缅印古道初考·····	陈 茜 (128)
附：对于《川滇缅印古道初考》的一点意见··	蒋忠新 (159)
古代东南亚的文化交流 —— 以滇缅路为中心·····	【日】藤泽义美 (163)
蜀布邛竹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	【台湾】桑秀云 (175)
蜀布与Cinapatta —— 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 ·····	【香港】饶宗颐 (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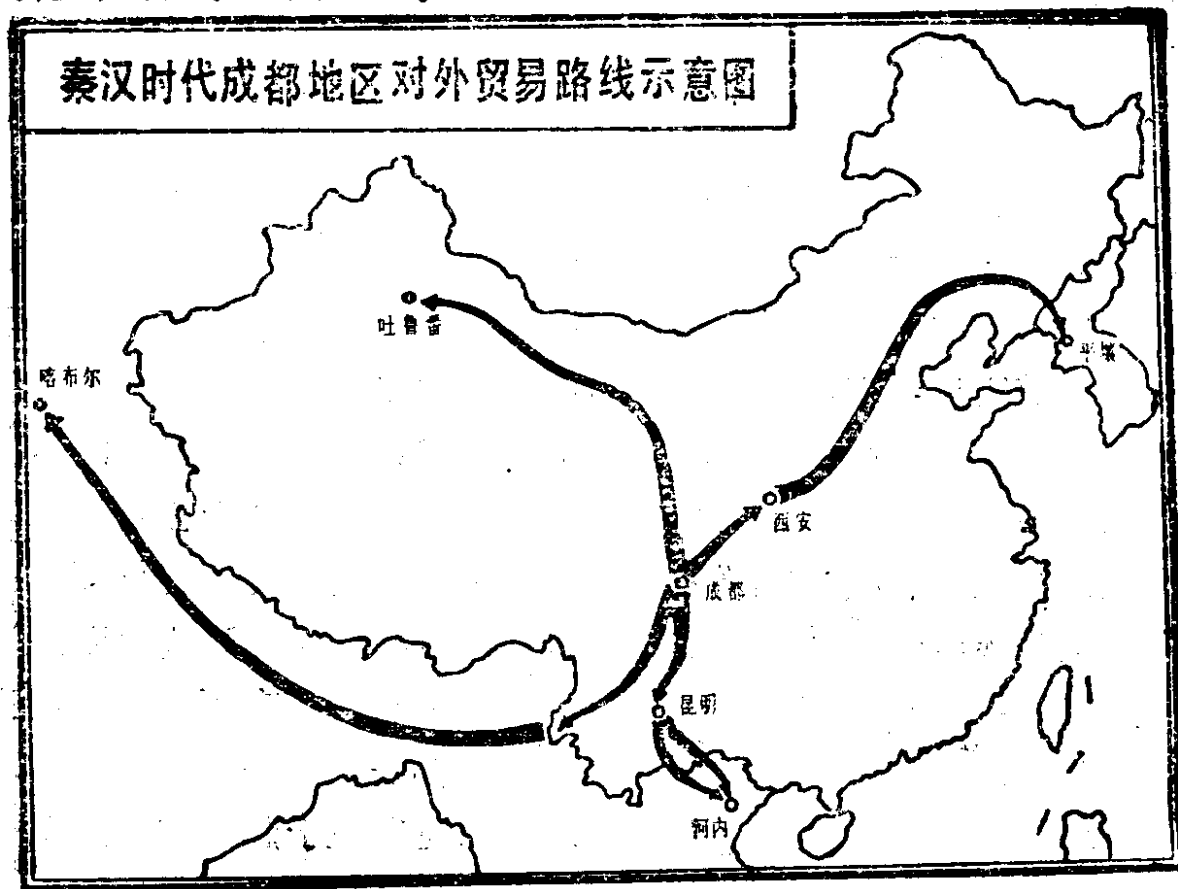
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

.....	张增祺 (234)
南方丝绸路与西南文化	龙建民 唐楚臣 (245)
中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史料选录	江玉祥 (259)
“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综合考察”课题参考	
书籍文章目录	江玉祥 (269)
编后记	(275)

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

童恩正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物产丰饶、人口众多的四川，在对内、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已与日俱增。作为四川省会的成都市，当前已经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起到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它将面向世界，以一个崭新的国际城市的面貌引人注目。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成都与外界的联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早在秦汉时代，即公元前三世纪末至公元初，这座西南古城及其邻近地区，已经与中亚、东南亚、东北亚发生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了（图一）。



图一 秦汉时代成都地区对外贸易路线示意图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伐灭开明氏建立的蜀国以后，经过五年的经营，大局初定。秦政府为了巩固在这片新占领的土地上的统治，发展生产，进一步开拓西南边疆，迫切需要一个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于是在公元前311年，由张仪和蜀守张若负责，正式修建成都城。当时的城市分大城和少城两部份。大城在东，是蜀郡郡治所在地；少城在西，又分南北两部，是工商业集中的地方。张咏《创设记》：“按《图经》，秦惠王遣张仪、陈轸伐蜀，灭开明氏，卜筑蜀郡城，方广十里，从周制也。分筑南北二少城，以处商贾。”^①足见发展工商业正是当时城市规划的重点之一。张仪等在少城中，“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②又在夷里桥南岸立锦官城，“锦工织锦濯其〔江〕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③所谓“贝锦斐成，濯色江波”^④，就是描写当时生产的盛况。少城之西，还有“车官城”，估计是一营造车辆的工场集中地。

与此同时，张仪、张若又在邻近成都的郫县、临邛（邛崃）筑了城。而以后在汉代属于广汉郡的雒县（广汉），可能在此时也初具规模，因为解放前后在广汉中兴乡一带的考古发掘证明，从西周至春秋时，这里已有较集中的手工业作坊了^⑤。这样，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末，就以成都为中心，逐步形成了一个商业、手工业区。其中成都、郫县、雒县主要生产纺织品及铜器、漆器，而临邛则主要生产铁器。蜀人并利用这些产品与今天云贵一带的少数民族进行着频繁的贸易。《史记·西南夷列传》记夜郎、靡莫、滇等族时说：“秦时常谿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既然置吏，当然就有商业往来了。这种贸易，还有可能辗转到达了中南半岛的北部。根据现有的资料，在公元前500年以后，即战国至秦这一段历史时期之中，铁器已经出现于越南红河三角洲和泰国东北部^⑥。这些铁器，很有可能是从临邛输入的。因为与

中南半岛接壤的广西、云南，迟至西汉，仍不产铁。汉代盐铁专卖，但邻近交趾之合浦、郁林、牂牁、益州诸郡，均未设铁官，即可为证。与此同时，《史记·西南夷列传》却明确记载，至少从秦代开始，临邛就成了中国西南铁器生产的基地，并且向周围的少数民族输出。如西汉时卓氏“即铁山冶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又程郑氏，“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⑦而他们发家致富的祖先，都是秦代从黄河流域迁来的。

从成都地区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即以后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或“滇缅道”^⑧，有可能在战国时代已经初步开通，因为解放以前在成都西北茂汶地区的早期石棺葬中，曾发现过琉璃珠，测定结果并不含钡^⑨，而我国战国时代自制的琉璃制品，则属于铅钡玻璃，不含钡的钠钙玻璃，均是从中亚或西亚输入的^⑩。考虑到云南江川李家山属于战国时代的24号墓已经出土来自西亚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则这些产品从南道输入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⑪。附带需要说明的是：茂汶地区西汉时代的石棺葬所出琉璃珠，亦有铅钡玻璃制成者^⑫，这是中国本土的制品，可能是从成都地区输入少数民族的。

在印度史书《国事论》（Arthashastra）中，曾经提到“脂那”（Cina）之地产丝及红黑两色或黑白两色之织皮。按丝即丝织品，而织皮为毛织品，即氍毹之类，根据饶宗颐先生的研究，

“脂那”乃秦之对音，此处系指四川。按《国事论》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末，其时巴蜀已被秦所灭（公元前316年），故蜀地所产之丝织品及毛织品，自可被目为秦地所产^⑬。从此推知四川与印度之间的商业交往，应开始于《国事论》成书以前。

西汉时期，成都地区的经济继续发展。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当时首都长安户数为80800，而成都的户数也达到76256，成为全国第三大城市^⑭。当时工商业繁荣的情况，左思《蜀都赋》有很生动的描写：“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

之渊。改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袿服靓妆。贾贸壅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至于手工业生产，更是闻名。后人记载这一地区，“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⑤。真是“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⑥。由于产品的丰富和质量 的提高，就为国际市场的开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尽管在秦代成都地区已经向南方民族开展了贸易，但西汉初年，由于北方匈奴边患严重，汉政府“专力事匈奴”，无暇兼顾南方，于是又关闭了蜀郡的边徼，但是商人们利之所趋，经常“窃出商贾，取其笮马、犍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⑦。所以以成都地区为中心的向南方地区的贸易，事实上并没有停止过。汉武帝时，曾经企图加强与中央诸国的联系，其目的 一是夹击匈奴，二是进行物资交流。当时由于北方有羌族和匈奴的阻隔，乃转而探索南方的道路。于是张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驪，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⑧从“因蜀、犍为发间使”的记载来看，这种开拓事业是以成都为据点，这就在客观上促进了成都与南亚、东南亚贸易的发展。

在西汉一代，蜀人与东印度的阿萨姆地区，似乎保持了经常的贸易。当汉武帝派出的“出邛、僰”的使者南行至今云南洱海区域时，即被僬、昆明等游牧民族所阻，不能前进。他们的目的虽未能达到，但是却带回来一个情报，那就是“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此处言“奸出物者”，是因为这些商人违背了“关蜀故徼”^⑨的禁令，继续“窃出商贾”，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此种贸易带有走私的性质。根据某些学者的研究，从方位、里程、乘象习俗及“滇越”音读来看，这个国家应为阿萨姆地区的迦摩缕波国^⑩。

从战国至两汉，四川织锦行销全国，如长沙发现之战国织锦，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墓出土战国织锦，有的研究者即认为

是蜀地所产^①。在汉代与西域诸国的贸易中，四川的丝织品无疑是重要商品之一。近年来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品，其中就包括了部分蜀锦，从南北朝至唐代的实物俱备^②，推测此类贸易之开始绝不会晚于汉代。一直到唐代时，四川的丝织工艺仍然历久不衰，成为西域的畅销品。故吐鲁番所出唐代文书中保留有“益州半臂”、“梓州小练”诸名目^③。

除了北方的丝绸之路以外，成都地区的产品无疑还经南路到达中亚，即直接贩运到今巴基斯坦境内之印度河流域，然后转手远销大夏，即今阿富汗的北部。此条商路之开辟，绝不会晚于公元前二世纪。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有这样一段很有名的记载：张骞从西域回来以后，报告汉武帝说：“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据夏鼐先生考证，此“大水”当指印度河。1936年，考古学家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约60公里处发掘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Kaplsu，约建成于公元前4世纪的后半期）时，曾经在一处城堡中发现许多中国的丝绸^④。考虑到西汉前期强大的匈奴骑兵及剽悍的月氏曾经多次遮断了沿河西走廊西行的“丝绸之路”，那么这些丝绸（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有可能是从成都经滇缅道运到印巴次大陆，再到达中亚的。

在蜀地丝绸贸易繁盛之时，其产品甚至有可能到达了希腊、罗马，在脱烈美的《地志》里，记有一产丝之地，名叫Seres。其东有人所不知的地域，多沼泽林木；其西有大山与游牧民族；其南有北印度及Sinae。四围有山，就其方位来看，有学者考证Seres即指古代之蜀国，而Sinae则为滇国^⑤。如果不是蜀地的丝绸曾经远销地中海沿岸，则当地人是难以留下这种记载的。

西汉时，临邛的铁器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向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输出的数量也大为增加。在云南、贵州等地的汉墓中，蜀郡制造的铁器是常见之物。除此以外，在越南北部清化省的东山遗址及广平省的某些汉墓中，也发现了铁器，种类有刀、剑、锛、斧等，随之出土的还有西汉和东汉的五铢钱，证明它们是从中国输入的^②，而制造这些铁器的地点，可能就是临邛。越南北部古代的主要居民史称骆越，从文字记载及铜器上镂刻的人物图象来看，他们的发式也是“椎髻”（即锤形髻），属于临邛铁器“贾椎髻之民”倾销的范围以内。

与此同时，成都地区的漆器，也畅销远方。众所周知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的大部分漆器，就是成都所制^③。除此以外，远至朝鲜半岛，也有这种漆器发现。1916年，朝鲜平壤附近的古墓中即出土了一批蜀郡和广汉郡的漆器，其中最早的有西汉纪年^④，由此可见当时跨地区商业之繁荣。

至于西汉时成都对外贸易的道路，主要有西路、南路和北路三条。西路的第一段古称青衣路，以始于雅安地区（古青衣）而得名，经汉源、西昌，到达今会理县境以后，即折向西南行，经渡口、渡金沙江至云南大姚，最后到达大理地区。这就是《华阳国志·蜀志》所记：“三缝县……道通宁州（云南），渡泸（金沙江）得蜻蛉县（大姚）。”从大理出发，再沿“缅甸道”出国境，即经永昌（保山）循大盈江南行，经干崖到达缅甸境内的八莫，再西行至印度、中亚。

南路的第一段称“五尺道”，从宜宾南行，经高县、筠连，向西折入横江河谷，经豆沙关、大关、昭通、曲靖而抵昆明地区。由此又有两道可达越南，一经元江沿红河下航，是最古老的一条水道。另一条则经弥勒、文山出国境，沿明江而达河内地区^⑤。

北道是由成都出发，经广元沿金牛道、褒斜道等栈道到达关

中，再经长安而转运，这条道路是蜀与中原交通常用的一条商道，其开通应在战国，所以《史记·货殖列传》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如实地反映了这条道路作为经济命脉的重要性。

成都地区四周高山环绕，河流湍急，从自然环境来讲，交通是很不方便的。唐代苏頲《利州北题佛龕记》说：“吾见夫山连岷、嶓，水合江、沱，山兮水兮，路穷险郁”，道出了这里自然风光的特点。但是勤劳勇敢的巴蜀人民，凭着极简陋的工具，修栈道，架桥梁，筚路蓝缕，百折不回，终于打开了通向外界的道路，繁荣了国际市场，取得了“巴蜀殷富”的结果。与此同时，也为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足见决定一个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性的关键因素并非其地理位置，而是这一地区生产发展的程度，经济实力的大小，以及为改变其不利的地理环境而着重加强的对外交通线的修建。当我们目前正在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正确方针时，重温两千余年以前的这段历史，应该说还是有启发意义的。

注释：

① 转引自《蜀中名胜记》卷4，重庆出版社，1984年。

②③ 《华阳国志·蜀志》，巴蜀书社，1984年。

④ 左思：《蜀都赋》，《文选》卷4。

⑤ Graham, D.C.1934: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u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6, pp.114—131.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调查简报》，《文物》1961年11期，22—27页。

⑥ Higham, C.F.W.1983: "The Ban Chiang Culture in Wider Perspective", Mortimer Wheeler Archaeological Lecture.

- ⑦ 《史记·货殖列传》。
- ⑧ 藤泽义美：《古代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以滇缅路为中心》，《南亚与东南亚资料》第5辑，1984年，310—323页。
- ⑨ Cheng, Te-Kun 1946: "The Slate Tomb Culture of Li-F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June, pp. 63—80.
- ⑩ 高至喜：《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有关问题》，《文物》1985年12期。54—65页。
- ⑪ 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思想战线》1982年2期，82—87页。
- ⑫ Zhang, Dazhong and others 1985: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race Elements in the Archaeological Samples By PIXE", papers of the 1st Conference on IBA, Shanghai, China.
- ⑬ 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5本，4分，1974年，561—584页（台湾）。
- ⑭ 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可能是临淄。《汉书·高五王传》：“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
- ⑮ 《隋书·地理志》。
- ⑯ 《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
- ⑰ 《史记·西南夷列传》。
- ⑱ 《史记·大宛列传》。
- ⑲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 ⑳ 汶江：《滇越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2期。
- ㉑㉒ 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6期，70—80页。
- ㉓ 《正仓院宝物》（日），染织下，图版33，34。
- ㉔ 夏鼐：《中巴友谊的历史》，《考古》，1965年7期，357—364页。
- ㉕ 王治来：《中亚史》1卷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 ㉖ 杨宪益：《绎支那》，《译余偶拾》147页，三联书店，1983年。

- ②⑦ Janse, O.R.T.1958: "The Ancient Dwelling Site of Dong-S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Indochina.vol.3, Bruges, St.Catherine Press.黎文兰等:《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河内科学出版社,1963年(梁治民译)。
- ②⑧ 俞伟超等:《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的制地诸问题》,《考古》1975年6期,344—351页。
- ②⑨ 梅原末治:《支那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据②⑧转引。
- ③⑩ 参考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文物》1983年9期,73—81页。

(原载《成都文物》1984年第2期,又收入徐中舒主编《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

童 恩 正

随着近年来亚洲南部地区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新发现不断增多，对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古文化的综合比较研究也日益吸引了各国学者的注意^①。中国与中南半岛各国边境接壤最长的是云南省，所以各国学者注意的焦点，往往也就集中在云南一隅。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云南的确有很多文化因素与东南亚的考古发现有相似之处，反映出这两个相邻的地区在古代的关系异常密切。不过我们在全面审查此种关系的来龙去脉时，却发现东南亚古文化中明显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某些因素（不是全部），其发源地或表现得很集中的地区，并不是云南，而是四川。换句话说，在古代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的某些文化交流中，云南并不是传播的起点，而是传播的通道；起点应在四川。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古代亚洲东南部民族的关系和交通的路线，对于目前争论甚为剧烈的东南亚古文明的起源问题，也可提供一些有益的旁证。所以笔者愿意发表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正于海内外学者同人。

一、四川古代文化的特点和类型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四川的古代文化即具有内容丰富、生产经济类型多样的特点。这些特点的产生，主要与它的地理位置

和自然环境有关。

四川位于我国两大古文明区域——黄河和长江流域——之间的西侧。与四川北境相连的秦岭山脉，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主要分水岭，形成地理上南方和北方的重要分界线。从四川西部高原地区到四川盆地，金沙江、雅鲁江、大渡河、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等河流均自北向南流，如同在崇山峻岭之中开辟了若干条南北交通的走廊，自古以来就是南北民族迁徙来往的通道。这就使四川古代的文化，既带有南方文化的特点，又带有北方文化的特点。黄河中上游古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的交流，常以四川为中介。从东西方向来看，四川处于我国西部青藏高原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之间，因此又成为古代高原的狩猎采集或游牧民族与平原的农耕民族会合之所。这两种民族文化的融合，形成四川古文化的另一特点。

四川地区平原、丘陵、高原相间，气候各异，植被复杂，自然资源为不同类型经济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因此四川自古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进入历史时期以后，最有名的有巴、蜀两族。而在巴、蜀境内，民族成份仍然是复杂的。《华阳国志·巴志》记巴境内民族说：“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獯、夷、蜑之蛮。”《史记·西南夷列传》及《华阳国志·蜀志》等书记蜀邻近的民族，南（今宜宾地区）有僰，西南（今西昌一带）有邛都，西边从现在的雅安一带直达雅鲁江、金沙江流域有徙和笮都，西北（今阿坝州一带）有冉、駹等“六夷、七羌、九氏”众多的部落，北部则有白马氏等民族。如此复杂的民族关系，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自然也是复杂的。根据笔者的初步分析，在青铜时代，四川的古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类型，这就是川东丘陵地带的巴文化、成都平原的蜀文化、川西高原的笮文化以及川西南的邛都文化^②。这并不是说四川的古文化只有这几个类型，如川东南的僰族，可能就属于另外一个系统，不过由于目前发现的资